

梁启勋学术背景及其“国民性”借词首用书证研究

李 冬松

A Study on Liang Qixun's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His First Use of
“Guominxing” Borrowing Words as Documentary Evidence

Li Dongsong

Abstract: In the spring of 1903, Liang Qixun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and Education* on No.25 of *SEIN MIN CHOONG BOU*,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article had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by French scholar Le Bon. In the article, the modern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was used, which became the first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the word “Guominxing” in modern Chinese. Considering Liang Qixun's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the use of the translated word “Kokuminsei” in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Liang Qixun was unlikely to translate “Guominxing” directly from English, but during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he might have referred to *Le Bon's National Psychology* by Japanese scholar Tsukahara Seiji,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00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version of Le Bon's, and borrowed the translated word “Kokuminsei” from Seiji's book.

提要：梁启勋 1903 年春季在《新民丛报》第 25 号上发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并称该文译自法国学者李般英文版著作《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文中使用了“国民性”这个近代概念，从而成为现代汉语中“国民性”一词的首见书证。结合梁启勋的学术背景及“国民性”这个译词在日本明治时期的使用情况，可以推断出梁启勋不大可能从英语中翻译出“国民性”，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日本 1900 年出版的塚原政次译自英文版的《ルボン氏民族心理学》一书，并借用了该书中的“国民性”译词。

关键词：梁启勋；国民性；翻译；日本

绪言

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中，“国民性”是一个高频词汇，也是一个语义内涵丰富且重要的核心概念。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这个概念的词源却又是语焉不详、莫衷一是的。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多数学者虽认定“国民性”一词源自日语，是日本明治

时期的知识人从英语 *nationality* 或 *national character* 中翻译出来的，但又理据不足；也有学者认为，“国民性”是梁启勋从“国民心理学”中衍生出的概念。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出版的《辞源》中，都没有“国民性”这个词条，而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辞海》中，又显示“国民性”与英语 *nationality* 具有词源关系，与日语无甚干系；在《汉语大词典》中，“国民性”这个词条只有简短的解释，并无词源信息；高名凯、刘正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997）、史有为的《汉语外来词》（2000）、朱京伟的《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2003）、沈国威的《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2008）及《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2010）、黄河清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2001）及《近现代辞源》（2010）、狭间直树等的《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2013）、陈力卫的《近代知の翻訳と伝播——漢語を媒介に》（2019）等近代汉语外来语及词汇史、概念史研究中也都没有涉及到“国民性”这个词，冯天瑜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2004）中仅仅转载了日本学者飞田良文所列包含“国民性”在内的 519 例“新汉语”，未涉及“国民性”的词源问题。由此看来，“国民性”的词源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正是在此问题意识影响下，李冬木先后发表了《“国民性”一词在中国》（2007）和《“国民性”一词在日本》（2008）两文，历时地考证了“国民性”在日本译出的过程及其传播到中国的脉络。

李冬木关于“国民性”词源的研究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汉语中最早使用“国民性”一词的是梁启勋。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梁启勋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国民性”这个词的呢？他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的按语“著者识”中说：“本篇据英人的尔西 Dilthey 译法儒李般 Le bon 氏所著国民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 为蓝本”。据此可以认为，梁启勋的这篇文章是他从英语版中翻译而来的，他所使用的“国民性”与英语原文中的“*national character*”相对应。梁启勋将“*national character*”翻译为“国民性”的经过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1）梁启勋具有较高的英语读解能力，有将“*national character*”翻译为“国民性”的可能性；（2）梁启勋通过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英和词典查询到“*national character*”可以翻译为“国民性”；（3）梁启勋参考了该书的日译本，直接借用其中的“国民性”来对译“*national character*”。本文基于对梁启勋学术背景、日本明治时期辞书中“国民性”译词使用情况以及《*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日译本的考察，来梳理出梁启勋使用“国民性”一词的脉络。

一、梁启勋学术背景考察

有关梁启勋生平最详细的文献资料，目前首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其中写道：“梁启勋，字仲策，广东新会人，1876年4月16日生，梁启超之弟。早年在康有为万木草堂修业。1896年在上海《时务报》担任修改译稿工作。1902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后改为复旦大学）读书。后旅居美国数年。”^①然而，文中没有交代梁启勋旅居美国的具体时间。陈汉才的

《康门弟子述略》一书中说：梁启勋于1902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后改为复旦大学）读书，不久赴美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也就是说，梁启勋不是旅居美国，而是赴美国留学，其时间应在1902年年末或1903年初。

《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写道：“初八日，先生至舍路。该市为华盛顿省第一大都会，有华人三千余，美国境内保皇会之开，以此市为最先。是时，适南海先生次女康同璧和先生仲弟梁启勋来美游学，因与先生相遇于该市。”《梁启超年谱长编》依据“《合集·专集》之二十一”。而1989年中华书局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的《饮冰室合集》则在“《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长编》似有误。但《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收入的是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小标题为“三十六”。今取中华书局1936年单行本《新大陆游记节录（全一册）》，梁启超在该书中记载：

“初八日至舍路。舍路者，华盛顿省第一大都会，而太平洋岸重要之港口也。大北铁路以此此为终点。日本邮船会社之太平洋线亦以此此为终点。日本人在美国者以此市为最多，华人亦约三千。美国境内维新会之开，以此市为嚆矢云。康同璧女士与家弟启勋同来美游学，适至此市，相见甚欢。”

再者，吴天任新近编著的《梁启超年谱（第二册）》中也提到：“七月初八日先生至舍路，华人约三千，美国境内维新会之开，以此市为嚆矢，时南海次女同璧与先生之弟仲策（启勋）同来美游学，适至此市，相见甚欢。（同上游记三十六）”^②

通过对比，首先可以指出：上引《长编》“初八日，先生至舍路”中的“先生”二字无论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还是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新大陆游记》以及“走向世界丛书”本《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均无。显然属于后人添加的，且这种添加“先生”二字多次出现。从上引梁氏《新大陆游记》可知：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八日（1903年8月30日）抵达美国华盛顿的大都会“舍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女士“与家弟启勋同来美游学”，恰巧至此市即“舍路”，“相见甚欢”。文字中透露出，康同璧与梁启勋抵美游学不久。

陶四强编的《江门五邑书画名人录》一书提到：梁启勋曾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刘辉、荆溪宁等编的《著名家族档案》中则说，梁启勋同康有为之女康同薇一起赴美留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经济学。其中“康同薇”当为“康同璧”之误。二书都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学”，但都不提留学的具体时间。王学钧的《梁启勋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一文则说，梁启勋1902年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校（复旦大学前身），1903年由康有为资助，与康有为次女康同璧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③。姑且不谈是否由康有为资助，此文提及“1903年”为其留学美国的具体时间，值得注意。而更为权威且全面记述梁启勋留学美国信息的是梁启超1909年11月15日写给梁启勋的家书，这封家书主要内容是梁启超代为梁启勋申请官费留学资助的申请，其中比较详细地透露了梁启勋留学美国的时间及所在学校，里面写道：“留学美国西北大学第二年级学生△△△谨禀：为学费不继，援例恳请咨给津贴事。窃生以菲材弱质，幼习国学，徒胶故见，窃念当此交通大开之世，非求新

识于寰瀛，不足以效涓埃于祖国。乃以光绪二十九年自备资斧，负笈美洲。经在济仁市立中学校毕业后，以光绪三十二年考入美国伊里奈省之芝加高大学为预科生，三十四年升为正科生，专习政治经济科。宣统元年，转入同省之西北大学，为第二年级正科生。……梁次荪，广东省新会县人，年三十一岁，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考入美国伊里奈省芝加高大学政治经济科正科生，宣统元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转入同省西北大学同科第二年级正科生。”

有关康同璧的记载可为梁启勋赴美国时间提供佐证。据王明德的《百年家族》一书说：“康同璧，字文佩，号华鬘。戊戌变法的时候，虽不像姐姐那样做记者，当翻译，发表文章，编辑书稿，直接参与变法活动，但她的才气、胆识一点也不亚于姐姐，而且她的干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更像父亲。1901年康有为病卧槟榔屿，同璧闻讯，只身赴南洋看望父亲，遂留在父亲身边照料生活。在印度她陪父亲寻访佛迹，饱览名胜，探幽历险，几经危难，表现出一个女性少有的胆气，因而深得父亲信赖。1902年12月同璧还港省亲，并受父亲委托，赴欧美演说国事。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可见，康同璧于1902年12月“还港省亲”，并受父亲康有为委托赴欧美演说国事。据此，梁启勋与康同璧赴美国的时间当在1903年春夏间，也与上述梁启超家书及王学钧的看法一致。

二、梁启勋译事活动及其“国民性”借词首用书证

在1903年2月11日发行的《新民丛报》第25号上，载有梁启勋翻译《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的部分译文，即《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其中写道：“确然有所谓公共之心理特性者存，取族中各人之心理而综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这是梁启勋第一次使用“国民性”这个词，也是汉语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据前文可知，梁启勋是1903年春季赴美留学的，也即是说在他赴美之前该译文已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那么，翻译工作也当是他在震旦学校读书期间完成的。据王学钧研究指出，梁启超的好朋友吴德濡及马氏兄弟（马相伯、马建忠）曾建议他隐居读书，学好一两种外语，并由梁启勋陪读；梁启超也曾向马氏兄弟学习拉丁文、英文、德文，终因没有时间专心学习而废止，反而令梁启勋在新学氛围中逐渐掌握了日文和英文。由此可见，梁启勋在留学美国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日语和英语水平。

梁启勋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著者识”中说：“本篇据英人的尔西 Dilthey 译法儒李般（Le bon）氏所著《国民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为蓝本。”实际上，英文版中并无译者信息。李般（又译作勒邦 Gustave Le Bon, 1841-1931）是法国19世纪集体心理学泰斗，因1895年出版的《Psychologie des Foules》（英语名：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文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而名声大震。其《国民心理学》法文版初版于1894年，原名为《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由菲利克斯·阿尔坎出版商出版；李般在该书扉页写道：这本书是献给其好友夏尔·罗贝尔·里歇（Charles Richet）——巴黎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及《科学》杂志主编，以感谢他在杂志中所提供的无限热情与帮助。1895年出第二版时，李般对初版内容进行增加与调整，将初版第四编作为第五编，

还增加了第四编内容。1898年出版的英文版是以法文第二版的内容为蓝本出版发行的，书名为《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ITS INFLUENCE ON THEIR EVOLUTION》，由美国麦克米伦等出版社出版，并且英文版中缺少译者信息。此外，《国民心理学》英文本1899年又有英国伦敦版，而1912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该书封面中有“ANASTAIC REPRINT OF THE EDITION LONDON 1898.”文字。据此可知：1898年伦敦也出过英文版。从内容看，这些英文版本实属同一个人所译，但每个版本又都没有提及译者。

日文版译介者塚原政次也提到原英文版中缺少译者信息，他是从美国题名为《心理评论》杂志的临时增刊发行目录中获得“アール、テレチェブ”这一应是译者信息的。据梁启勋编译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说，李般该著英文版的译者是英人“的尔西 Diltthey”。这与塚原政次所说的译者テレチェブ在读音上极其接近，当为同一人。据塚原政次介绍可知：英文版的《国民心理学》（日译为《民族心理学》）是上文提及1898年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将李般发表在法国《科学评论》杂志上的系列论文按顺序集结出版而后翻译为英文的（日译为《民族心理学及び民族進化に於ける其の影響》），这与上述李般在初版扉页提到以此书献给他的《科学》杂志主编朋友的说法是一致的；据此推断，李般在出版此书前，曾将书中内容发表在了法国《科学》杂志上。梁启勋在编译《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的“著者识”中说：“本篇据英人的尔西（Diltthey）译法儒李般（Le. ban）氏所著《国民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其中英人“Diltthey”是不可能从当时的英文版获知，有可能是从日本人塚原政次的著作中获知的。

梁启勋在赴美留学之前，到底学了多长时间的英语，又达到了多高的水平，目前囿于关联史料匮乏，难以确认。但从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家书中可以窥见一斑。1904年春，梁启超在给已经赴美一年左右的梁启勋家书中写道：“弟在彼处既能求学，则亦宜安之，不可思逃遁他处，求适宜之校殊不易，此不可不察也。宜多学话，至要。”这里所透漏出的信息显示，此时的梁启勋英文水平还不够好，仍需继续努力。胡跃生认为，此时，梁启勋正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的济仁市立中学求学，为考入美国大学做准备，“学话”即是学习英语，过语言关。由此可知，1903年的时候，梁启勋的英语水平还谈不上很高，他到了美国之后，为进入美国大学学习，仍需要提升英语能力。直至1905年下半年，梁启勋的英文翻译水平才有长足进步。梁启超在1905年10月14日的家书中这样写道：“译稿已到，即日发印。此稿大好，弟文学亦长进矣。今拟改名《血史》，添注一行云，原名《世界著名暗杀案》。弟谓可否？……兄及汝嫂见弟能译（从西文）尔许大部书，喜而不寐，告之大人当更喜也。”从这封家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出，梁启勋在赴美国之前或刚到美国之初，并不具备翻译英文大部头专业书籍的能力。但是，梁启勋在赴美留学之前，已经具备了较高日文读解和翻译能力，这是有据可考的。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与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勋也随其兄来到上海，协助梁启超编印《时务报》。《时务报》开设有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西文报译、东文报译、路透电音、翻译连载等栏目，而梁启勋作为该报的编辑，主要负责翻译和编东东西文译稿。据沈国威研究，《时务报》从第3册（1896年8月29日）开始设置“东文报

译”，成为通过翻译日本报刊向中国提供信息知识的开端；从第 57 册（1898 年 4 月 11 日）改称“东文译编”；两年间共刊载 57 次，总翻译字数超过 40 万字；“东文报译”的译者一直由日本人古城贞吉担任。这样看来，梁启勋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识读日文报纸，并且有日本人古城贞吉作为工作伙伴，其在两年的《时务报》工作期间养成较高的日语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而能够验证他的日语能力的证据就是他翻译出版的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王学钧指出，梁启勋独自从事译述活动大概始于 1902 至 1903 年的时候，1903 年即翻译了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日本自幕末以来，从兰学转向西学，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已对欧美学术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研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学书籍，其对西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非中国所能比。因此，19 世纪末，无论是洋务派的张之洞，还是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都主张通过日本翻译的西学书籍来汲取西学。梁启勋当然也不例外，日本翻译的西学书籍成为他获取西学的桥梁。即便他到了美国，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日本的西学书籍仍是他翻译英语书籍的重要参考资料。就在梁启超鼓励梁启勋“弟译书事可速从事”这封家书中，梁启超还写道：“启业前书亦已觅得，一并寄上。彼自寄此书后，亦并无第二书来，想恶性终难改耳。化学书实尚未寄，因前日托皇后船之一崽仔带，而彼意未来，故至今各书仍存德猷（森）手也，今即补寄上。电学书日间访购便是。”由此可知，梁启勋在美国求学期间，梁启超仍不断地为他寄送所需要的日文参考书籍。为了便于搜求日本西学书籍，1905 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开办了一家书店，即中国书林，上文家书中提到的德猷就是梁启超从新会老家招来管理经营书店的同辈亲戚。关于这件事，梁启超在 1905 年 10 月 14 日的家书中曾写道：“现在东京开一支店，名曰‘中国书林’，生意大好。因现有学生八千余人矣，尔森哥在该店司事，森近极长进，任事有条理、有耐力，同人无不赞之。”

综上所述，梁启勋赴美留学之前直接从英文版《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中翻译出《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而他借助日本文献从事翻译的可能性是极高的。翻译一本英文学术著作，其中不仅涉及到著者思想脉络的研读，而且涉及到大量的近代概念，如何翻译这些近代概念是一个极其考验人的事情，而且也很难由一个人在短期内完成。仅就梁启勋文中所用“国民性”这个概念而言，在梁启勋译文发表之前，它所对应的英语“national character”这个词组在清末为数不多的华英字典中，只有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将之对译成汉语的“國人之性情”，将“Nationality”对译成“國之性情”和“好本國者”；而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双语辞书中，载有“national character”这个词组的辞典也不多，除了日本翻刻的罗存德《英华字典》，即《英华和译字典》（1881）、《英华字典》（1883）、《英华字典》（1884）中都沿用了罗存德的汉语译法，1886 年的《独英和三对字彙大全》将它翻译为“国民の性質、国風”。也就是说，梁启勋借助清末中国或明治日本的双语辞典来翻译“national character”为“国民性”的可能性很小。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借助日本已经翻译出版的书籍。而恰恰在梁启勋翻译该书之前，日本在 1900 年就出版了塚原政次译本《ルボン氏民族心理学》。在明治日本出版业兴盛、大批清末士人留学东瀛的背景下，梁启勋获得此书极其容易，读解起来更是如虎添翼。因而，梁启勋在参考塚原政次译本的前提下，短期内翻译出《国民心

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不存在任何障碍。另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档案记载：梁启勋“早年同梁启超在横滨经营《新民丛报》，废刊后，即渡美，入市俄古大学。”《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废刊于1907年11月；日本档案史料说梁启勋在《新民丛报》废刊后渡美留学显然有误；但他在震旦学院学习期间赴日协助梁启超经营《新民丛报》也不是没有可能，目前尚无佐证史料。如果日本外交档案史料所言梁启勋1902年在日本协助其兄办理《新民丛报》是事实，他接触、阅读英文版《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及塚原政次的《ルボン氏民族心理学》会更加便利。但是，即便梁启勋没有去过日本，他接触并阅读二书也不是难事。

三、梁启勋译本与塚原政次译本的雷同

梁启勋翻译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第一节即“种族精神之由来”，此部分计1100字左右的内容中所使用的近代概念、词汇，与日本人塚原政次1900年译本《ルボン氏民族心理学》一书中“第一章 人種の精神”有很多雷同。今参阅李殷该著作英文版中的第一编第一章中的五段文字，以对比考察梁启勋译文与塚原政次译文的关联，详参见下表：

李殷《民族心理学》中“国民性”概念英日中文本比对

序号	1898年英文版	1900年塚原译文	1903年梁启勋译文
1	NATURALISTS base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ecies on the observation of certain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regularly and constantly reproduced by heredity.	博物学者は人種の分類を為すに、遺伝に因って規制正しく一定不変に再生せらるる或る解剖上の特性を基機とする。	博物家类分种族，莫不观察其遗传之特性，以为基本特性。
2	The elements of classification which anatomy, languages, environment, or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re incapable of furnishing are supplied by psychology, which shows that behind the institutions, arts, beliefs,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of each people, lie certain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its evolution. It is the whol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form what may be called the soul of a race.	ろれで心理学は各民族の制度、技術、信仰、及び政治上の働きの内面に其の進化を定めるところの或る道德的及び知力的の特性がある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ある。ろれで我輩は是等の特性全体を総称して人種の精神といふのである。	心理学者盘踞各民族制度技术信仰政治之里面而左右其进化者也。谓之道德的与智力的之特性。此道德特性智力特性相结合而成民族之精神
3	This aggregate of psychological elements observable in all the individuals of a race constitutes what may rightly be call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或る人類のあらゆる個人に就いて観察することの出来る心理的要素の集まったものが所謂国民性といふものである。ろれで其の国民性は其の人種に普通の形に依って見る事が出来る。	确实有所谓公共之心理特性者存，取族中各人之心理而综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
4	If it be wished to state in precise language the influences which govern the individual and direct his conduct, they may be said to be of three kinds. The first and certainly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influence of ancestors; the seco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mmediate parents; the third, commonly supposed to be the most powerful, but nevertheless the weakest, is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個人を支配し、其の行為を指揮する影響を明らかな言葉にて言はうと思へば、三種類といふことが出来る、第一は祖先の影響、第二は両親の影響、第三は境遇の影響である。	故夫统属各个人而指挥其行为者凡有三事：一曰祖先之影响二曰间接两亲之影响三曰周围环境之影响

5	A race may be compared to the totality of the cells that constitute a living being. The existence of these milliards of cells is very short, whereas the existence of the being formed by their union is relatively very long;	一の人種を或る生活体を作つて居る細胞の全体に較べると、此の細胞は新陳代謝に依て時々刻々消滅して行くものなれど、其の生活体全体は長く活き遣つて行くのである。	种族与个人之关系恰如生物与细胞之关系，聚无量数细胞而成一生物，彼细胞者新陈代谢刹那刹那旋生旋灭者也。然细胞之生命虽甚短，而细胞所结成之生物其生命则甚长。
---	--	---	--

通过上表文本对比可知，在梁启勋译文中，凡是关于近代概念的新词汇基本都和塚原政次1900年的译本保持一致，除非梁启勋直接参考了塚原政次的译本，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一致之处。具体而言，“遗传”这个词是英语“heredity”的译词，其形容词是“Hereditary”；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中，还没有名词形式的“heredity”，只有形容词“Hereditary”，马礼逊把它译为“世袭”；在罗存德的《华英字典》（1866-1869）中，也没有名词形式的“heredity”，只有形容词“Hereditary”，罗存德把它译为“世袭、袭荫、继”等意思。也就是说，在早期传教士编写的华英字典中还没有“遗传”这个译词出现。“遗传”一词在汉语中最早出现在1881年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第三册《互相问答》：“人胖之原故间有父母遗传者。”在日本方面，幕末时期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中，也没有名词形式的“heredity”，只有形容词“Hereditary”，堀达之助把它翻译为“譲ラルベキ。代々ノ”。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的重视及研究的深入，一些近代西方概念也有了新的译词。在柴田昌吉、子安峻编写的《英和字汇》中，尽管仍没有出现名词形式的“heredity”，但形容词“Hereditary”已有了新译词，即“相伝ノ、世襲ノ”。而在1881年的《哲学字汇》中，名词形式的“heredity”第一次出现在日本词典中，并被翻译为“形質遺傳（生）、世襲（法）”。到了岛田丰的《和译英字汇》（1888）中，“Hereditarily”被翻译为“遺傳ニテ。相傳ニテ”，“Hereditary”被翻译为“遺傳ノ。相傳ノ。世襲ノ”，“Heredity”被翻译为“（法）世襲”。

“细胞”这个词是英语“cell”的对译词。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cell”被翻译为“监房，蜂房”；罗存德的《华英字典》将“cell”翻译为“房仔、小房、穴、洞、窟”等意思。在汉语中“细胞”一词的最早用例是1858年韦廉臣辑译，李善兰笔述的《植物学》卷二：“植物全体中，有无数细胞体，胞中皆有流质，此细胞一胞，为一体相比附而成植物全体。”据中山茂考证，“细胞”一词始见于1834年宇田川榕菴的《植学启原》。其实，早在1826年的《重订解体新书》中就已经有了“细胞”一词的用例了：“又犹橘柚瓢剥白膜者。细胞累累津液充满者。”只不过这里的“细胞”一词还不是英语“cell”的译词，只是日本幕末兰学家研习兰学过程中创造的一个新词而已。即便是在堀达之助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中，“cell”被翻译为“空窖。寮（僧ノ。小室。）細キ管（樹木ノ）”。在日本明治很长一段时期，不少词典都沿用了堀达之助对“cell”的翻译词。直到1881年的《哲学字汇》，始见将“cell”直接翻译为“细胞”。

“心理学”这个词是英语“psychology”的对译词。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没有这个词，罗存德的《华英字典》则把它解释为“灵魂之学，魂学，灵魂之智”。在汉语中，“心理学”这

个词最早见于1898年《大东合邦新义》：“心理学研究性情之差别，人性之作用者也，泰西人以为众学之本。与宋儒性理学不同，四官者，耳目鼻口也。四能者，轻重、寒暖、刚柔、动静之触觉也。”在日本幕末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把“psychology”翻译为“精心ヲ論スル学”；日本明治时期的《英和字汇》则把它翻译为“精心論”。直到1881年的《哲学字汇》才把它翻译为“心理学”。

“国民性”是英语 *nationality* 或 *national character* 的对译词。早在日本幕末堀达之助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就有 *nationality* 这个概念，并释义为“民性、民情、民生”，但没有 *national character* 这个词组。在日语中，1886年的《新撰英和字典》中已经有了“国民性”对译 *nationality* 的迹象。而在1890年国府寺新作的译著《鲁氏教育学》中则有了明确的“国民性”用例：“大家ノ美術詩文ニシテ国民性ノ勢力ヲ特有スルモノハ此二算入ス可キナリ”。但迟至1908年才有《独和兵语辞书》（第4版）将德语 *nationalcharakter* 翻译为“国民性”，将德语 *Nationalität* 翻译为“国风”“民族性”“国籍”等汉语词。此后不久，即1910年的《哲学大辞典》（第二册）中始有“国民性”独立词条，并且对译英语 *nationality*、德语 *Volkstümlichkeit* 或 *Nationalität*、法语 *Nationalité*，这是目前所见“国民性”作为独立词条进入辞书的最早书证。在中国语境中，清末罗存德的《华英字典》最早将 *nationality* 和 *national character* 与汉语建立起了联系，前者被翻译为“国之性情，好本国者”，后者被翻译为“国民之性情”。目前有书证显示最早接触这个西方概念的中国人是谭达轩（谭宴昌），其187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汇集·通商指南》中，将 *nationality* 解释为“love of one's nation, 爱本国”。邝其照则在其1887年的《华英字典集成》中，将 *nationality* 对译为“国，国人”。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将 *nationality* 对译为“国风，民情；nation, 人民，邦国”。颜惠庆在其1908年的《英华大辞典》中，将 *national character* 对译为“国人之性情”，*nationality* 对译为“国风，国体，民情，民性，国之特性；国籍，籍；国民，人民，百姓；爱国心”，明显有受到罗存德字典的影响。纵观市面上所能见到的清末双语辞书，要么是没有收入这个概念词汇，要么是没有用“国民性”来对译的先例。民国初年的《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中，*nationality* 对译为“国风，民情，人民，邦国”。甚至在1923年的《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中，*nationality* 词条也没有使用“国民性”这个对译词，其释义为“国家，属于国家之状态性质或关系，*national character* 国性，常特指认为一国之政治独立，国家资格；爱国心，国家利益或国家统一及独立之倾向或主张”。

“新陈代谢”这个词自近代以来，开始成为英语“*Metabolism*”的对译词^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罗存德的《华英字典》中都没有这个词，汉语中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文献是1907年孙佐译述《生理卫生新教科书》第三篇：“因消费而生之废料排出体外，同时即补充诸组织之所消费，此作用曰新陈代谢，其补充之物则由食物内摄取之。”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则把“*Metabolism*”翻译为“细胞内消化作用”。在日本，幕末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也没有收录这个词。根据朱京伟的研究，日语中“新陈代谢”一词创制于1881年丹波敬三等从德文版翻译而来的《普通植物学》一书，其中写道：“其周圍ニ新細胞ヲ發生スルニ由テ常

ニ新陳代謝シ其最モ外部ニ位スル細胞層所謂根帽ハ茲ニ剝落シ去ルモノナリ”。直到1900年日本才有《独和外国字書大全》将“metabolism”翻译为“变化、变移、病ノ革マルコト、文字ヲ植エ誤ルコト、道德風俗ノ変スルコト、時ノ移リ易ハルコト”。1902年，《新译英和辞典》把“Metabolism”翻译为“(生理)同化作用[細胞ノ]，代謝機能”。1912年的《哲学字汇》增订版则是最早将“Metabolism”对译为“新陳代謝”的词典。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从幕末兰学时期就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近代概念，《解体新书》是其集大成之作，其中的很多生理学、医学词汇在日本及中国沿用至今。进入明治时期后，日本更加从广度和深度上积极接受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中的近代西方概念，编译了大量的英和、法和、德和双语词典，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诸如上述提到的遗传、细胞、心理学、国民性、新陈代谢等近代西方概念在日本社会传播开来，甚至远播到中国。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的胞弟，梁启勋具有接触日文书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1903年译介李般的《国民心理学》一书时，参阅塚原政次1900年译介的《民族心理学》有着充分的可能性。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最有力证据是译文中“新陈代谢”一词的使用。因为，李般原著中并没有使用“新陈代谢”，即“Metabolism”这个概念。实际上，在1910年前田长太的全译本《民族發展の心理》中，上表第3段原著中的“national character”也没有被翻译为“国民性”，而是“国民的性格”；上表第5段内容，前田长太则翻译为：“抑々種族は生物を組織する細胞の総合にこれを比することを得べし。かの千万無量の細胞は、これを個々として考ふればその生存期間甚だ短けれども、その総合によりて組織せらるる生物としてこれを考察すれば、その生存期間は比較的に長久なりとする。”前田长太译文中没有使用“新陈代谢”这个词，说明它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在1935年的张公表中文版全译本《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中：“一种族是能与构成一生物之全部的细胞相比较，此亿万细胞之生存期乃是极短的，而由其联合所构成之物体之生存，则比较极为长久。”这段译文也没有使用“新陈代谢”这个词。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揭示：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出现了诸多近代概念词汇如：心理学、遗传、细胞、新陈代谢等，应取自日本人塚原政次译本《ルボン氏民族心理学》一书，尤其是他所使用的“国民性”概念更是采自塚原政次1900年译介的《ルボン氏民族心理学》。

结语

无论在任何语言中，一个新概念的产生，理论上存在着一个最先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然而，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某个概念的最早使用者，皓首穷年而不得者比比皆是。即便是到了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计算机检索、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也只是为文字考据提供了诸多方便，尚难以穷尽所有的文献。李冬木曾指出，梁启勋从日语中借用“国民性”一词的1903年是现代汉语中“国民性”这一概念出现的元年，当时的留日学生很可能是这一词汇的积极使用者和传播者。但是，目前尚无确切证据显示梁启勋留学过日本，甚至不见关于梁

启勋去过日本的确证史料^⑥。就目前所见史料及研究成果而言，梁启勋是“国民性”这个日语借词的最早使用者。

“国民性”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确立其首用书证，对于理解其本质内涵，梳理其语义流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民性叙事为何被人民性叙事所取代？国民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的转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进的今天，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过时？要客观而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从“国民性”这一概念的原点开始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重新解读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及其国民性话语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 ①《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提及，梁启勋于“1912年任天津《庸言》杂志撰述，翌年任《大中华》杂志撰述。1914年任北京中国银行监理官，又任币制局参事。1928年脱离政界。1931年执教于青岛大学。1933年在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任训育主任。1938年任职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平解放前夕，他为北平地下党组织做过有益的工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5年11月14日病故，终年89岁。”（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中华书局，2001年，第46页。）
- ②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三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0096册，第368-369页。《专集》之二十二所记载相同。“走向世界丛书”的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大北轮船公司》所载亦同（岳麓书社1985年，第534页）。新会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全一册）》，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发行，民国三十年一月三版，第100页。吴天任著《梁启超年谱》（第二册），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72页。
- ③与上述诸说持梁启勋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同，胡跃生则认为，梁启勋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其兄梁启超帮助下留学美国，先入伊利诺伊州格雷市中学学习，毕业后考入芝加哥大学预科，后转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笔者曾电话咨询胡跃生先生，获知他是从梁启勋与梁启超往来书信得出上述看法的。（胡跃生校注，《梁启超家书校注本》，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6-7页）。1905年11月16日，梁启超致书梁启勋：“今所寄信，乃交账房寄，后询彼等，知其乃写‘寄芝加高会所’者，恐弟不收到，故补寄此。谅尚有他件在会所，弟可往一询。”（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3页）胡跃生据此认为，其中“芝加高会所”即芝加哥广东同乡会，其时梁启勋在芝加哥大学预科学习。
- ④笔者按：《科学评论》应与《科学》为同一刊物，其中“评论”二字应是塚原政次所加。
- ⑤在古汉语中，《淮南子·兵略》中已有“代谢”一词，原文“若春秋有代谢”，意指春夏秋冬四时交替。到了汉代蔡邕《笔赋》始有“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指新旧交迭更替，是四季循环的常序。而“新陈代谢”整词最早见于明代李维楨《大泌山房集》第三十二卷及王锡爵《王文肃集》第二卷，原文“新陈代谢之故衰荣倚伏之机杂然百变于前”。在近代西学东渐中，拥有丰富汉学知识的日本幕末明治时期的知识精英开始频繁使用“新陈代谢”一词，用古汉语词汇翻译西方近代概念成为他们常用的手法。如将明治十二年的《小学读本字引》中“新陈代谢”被解释为“フルキヲアタラシキニカヘル”（浅井藤八翻刻，1879年，第43页）；浦部章三用“新陈代谢”对译英语“new for old”（《法律字汇》，江草斧太郎，1890年，第137页）；《新汉和大辞典》中将“新陈代谢”解释为“ふるきものは去りてあたらしきものこれに代る”（滨野知三郎，六合馆，1912年，第678页）。相较于日本从幕末开始使用古代汉语翻译西方近代概念，中国则明显滞后，如1908年的《英汉医学术语辞典》中，“metabolism”被翻译为“**腸長廢**”（Philip Brunelleschi Cousland, 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Medical

Missionary Assn. of China, 1908, p.219.); 同年出版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中,“metabolism”被释义为“(生物)屬(物質)長衰,細胞内消化作用。”(颜惠庆, 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M-Z, Commercial Press, 1908, p.1433.)。直到1916年,赫美玲才在上述二辞典释义的基础上,使用“新陈代谢”对译“metabolism”：“Metabolism, n., 腸長廢新 wang chang / 新陳代謝 hsín ch'én tai hsieh.” (Karl Hemeling,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话), p.867.); 而同时期的《辞源》中,也在释义中加入了近代西方生理学内容:“谓事物之变迁也。生理学上谓排泄废物吸收养料之交互作用。以发生全体之生活力者。亦曰新陈代谢。”(方毅,《辞源》甲种第1-6卷,商务印书馆,1916年,卯集第184页)。*《辞源》*的词条释义明显带有参考日文释义的痕迹,如日本的*《新修百科大辞典》*中,“新陈代谢”条释义为:“しんちんたいしゃ 新陳代謝(生物)生物体は生活現象を営むため、絶えず体内の物質を科学的に分解してエネルギーとなし、熱、運動等の生活力を得る。又老朽した細胞は死滅して、新しい細胞と交る。この結果生じた陳套物質は体外に排泄され、その補償として外界より新鮮な物質(食物)を摂取し、同化して自己の成分とし、又これを分解する。この作用を新陳代謝といふ。”(长谷川诚也,《新修百科大辞典》,博文馆,1934年,第705页。)

⑥由于梁启超举家长期在日本居住,梁启勋具有赴日的客观条件,也有赴日的主观愿望。但是,无论是赵丰田、丁文江的《梁启超年谱长编》,还是吴天任的《梁启超年谱》,以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和《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都没有提及梁启勋赴日的片言只语。有趣的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外交档案中,1908年12月11日乙秘第1504号《檄文發送者ニ就テ》中写道:“……其領袖梁啓超ハ兩宮崩崩ノ變アルヤ之ヲ袁ノ罪ニ口シ之ヲ誅スベキトノ電報ヲ本國各都督ニ發シ……其實弟トシテ米國ニ遊學セン梁啓勳タル者口旨受ケテ來朝シ東京横浜及兄ノ住所ナル兵庫縣須磨間ヲ往來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EL No.1-0564, 第440900頁)1908年12月12日乙秘第1516号警視總監龜井英三郎給小村外務大臣の報告《梁啓勳ニ就テ》中写道:“梁啓超ノ實弟梁啓勳ハ米國留學口兄ノ旨ヲ受ケテ歸朝シ東京横浜及兄ノ住所ナル兵庫縣須磨間ヲ往來シ保皇黨ノ為……”。(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EL No.1-0564, 第440909頁)1908年12月16日乙秘第1562号警視總監龜井英三郎給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寿太郎の報告《梁啓勳ニ就テ》中写道:“既報梁啓勳ハ去月下旬梁徳猷ト共ニ在須磨怡和別荘ナル梁啓超ノ許ニ口約十日間程滞在米國市俄古ニ向ク出発……梁啓勳ハ当年三十三才トシテ先年梁啓超ト共ニ横浜ニテ新民叢報ヲ経営口口廢刊後直ニ渡米シ市俄古大學ニ入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EL No.1-0564, 第440915頁)但是,1908年12月15日兵发秘第451号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给外务大臣伯爵小村寿太郎的報告《清國人梁啓勳ニ就テ》完全否定了上述说法,其中写道:“梁啓超ノ口弟ナリト稱スル東京市神田区表神保町梁徳猷(一名梁啓森ト稱ス)ノ來往ニ関シテハ曩キニ及申報置候処之レト同時ニ梁啓超ノ實弟梁啓勳ハ實兄梁啓超ノ旨ヲ受ケ米國ヨリ來朝シ共ニ保皇黨ノ為メ運動シツツアリテ客月下旬相携ヘテ來泉ノ旨警視庁ノ通報ニ接シ逐一調査ヲ逐クル処梁徳猷ガ本月四日東京ヨリ來泉シタルハ既報ノ通り單身ニシテ更ニ同行者ナク又其前後ニ於テ梁啓勳ト稱認ムベキ者來泉シタル形跡更ニナシ今本人ノ現状ニ関シ梁等ト行動ヲ共ニスル当地在留某清國人ノ語ル処ナリト謂フヲ聞クニ口口梁啓超ノ實弟ニシテ梁啓勳ト稱スル者アリ芳紀正サニ二十俊秀ノ青年今ヤ米國ニ留學中ニシテ専心意ヲ學業ノ修養ニ用ヒ更ニ他意アルナク故國ノ政變ニ関シ實兄梁啓超ノ旨ヲ受ケ來朝スルカ如キハ殆ド有リ得ベラサルコトニシテ今日現ニ米國ニ在學中ナルハ口口フベカラザル事實ナリ云々以上ノ言説ニ徴セバ警視庁通報ノ啓勳來朝ノ件ハ或ハ彼等同志間ニ於テ何等カガ為メニスル処アルニハアラズヤト思料セラル。”(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EL No.1-0564, 第440918頁)由此可见,日本外交史料中有关梁启勋赴日一说也存在着道听途说之嫌,无法确证梁启勋到过日本。参见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2-495页。

参考文献:

- [1] 鲍绍霖 (1991),《国民性研究: 东西文化相互影响三部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1期,第43页。
- [2] 刘禾 (1993),《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1页;
- [3] 汪卫东、张鑫 (2003),《国民性: 作为被“拿来”的历史性观念——答竹潜民先生兼与刘禾女士商榷》,《鲁迅研究月刊》第1期,第66页。
- [4] 孙强 (2008),《晚清至五四的国民性话语》(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第41页。
- [5] 李冬木 (2007),《“国民性”一词在中国》,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第91号。
- [6] 梁启勋 (1903),《国民心理学与国民教育之关系》,《新民丛报》第25号,第1(49)页。
- [7] 陈汉才 (1991),《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14页。
- [8] 赵丰田、丁文江 (1983),《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8-329页。
- [9]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9),《饮冰室合集·专集22-29》第7册,第100页。
- [10] 陶四强 (2004),《江门五邑书画名人录》,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第41辑,第36页。
- [11] 刘辉、荆溪宁等 (1999),《著名家族档案》,时事出版社,第277页。
- [12] 王学钧 (2006),《梁启勋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明清小说研究》第1期,第67-68页。
- [13] 汤志钧、汤仁泽 (2016),《梁启超家书: 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77-388页。
- [14] 王明德 (2003),《百年家族: 康有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93页。
- [15] Gustave Le Bon (1894),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F. Alcan, 1894.
- [16] Gustave Le Bon (1895),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F. Alcan, 1895.
- [17] Gustave Le Bon (1898),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898.
- [18] Gustave Le Bon (1899),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T. Fisher in London. 1899.
- [19] Gustave Le Bon (1912),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New York: G. E. Stechert & CO. 1912.
- [20] 塚原政次 (1900),《ルボン氏民族心理学》,育成会,第8-9页。
- [21] 胡跃生校注 (2017),《梁启超家书校注本》,漓江出版社,第30,302-303页。
- [22] http://news.99ys.com/20120919/article--120919--102109_3.shtml
- [23] 沈国威 (2010),《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用》,中华书局,第368页。
- [24] W. Lobscheid (1868),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Daily Press, pp.344, 954, 1211-1212, 1397.
- [25] 石云艳 (2005),《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第493页。
- [26] Robert Morrison (1815-1823),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BLACK, PARBURY, AND ALLEN, pp.60, 210.
- [27] 黄河清 (2010),《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第797,823-824,878页。
- [28] 堀达之助 (1862),《英和对译袖珍辞书》,洋书调所,第115,364,526,643页。
- [29] 柴田昌吉、子安峻 (1873),《英和字汇》,日就社,第479,900页。
- [30] 和田垣谦三、国府寺新作、有贺长雄、井上哲次郎 (1881),《哲学字汇》,东京大学三学部,第13,39,74页。
- [31] 岛田丰 (1888),《和译英字汇》,大仓书店,第363页。
- [32] 马西尼著,黄河清译 (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第254页。
- [33] 杉田玄白翻译,大槻玄泽重订 (1826),《重订解体新书·名义解》,须原屋茂兵卫,第24页。

- [34] 沈国威（2000），《植学啓原と植物学の語彙》，关西大学出版部，68-78 页。
- [35] 井波他次郎纂译（1886），《新撰英和字典》，云根堂，第 432 页。
- [36] ヨハン・カール・フリードリヒ・ローゼンクランツ，国府寺新作訳注（1890），《教育学（魯氏）第 2 部》，牧野善兵衛，第 205 页。
- [37] 藤山治一、高田善次郎（1908），《独和兵语辞书》（第 4 版），独逸语学杂志社，第 566 页。
- [38] 大日本百科辞书编辑部编纂（1910），《哲学大辞书》（第 2 册），同文馆，第 819 页。
- [39] 谭达轩（1875），《华英字典汇集・通商指南》，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HONGKONG. 第 483 页。
- [40] Kwang Ki-Chaou（1887），*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ah Cheung, 1887, p.218.
- [41] 罗存德等（1902），《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商务印书馆，1902 年，第 1099 页。
- [42] 颜惠庆（1908），《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第 1433, 1506 页。
- [43]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3），《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商务印书馆，第 340 页。
- [44] Noah Webster（1923），《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商務印書館，第 969 页。
- [45] 朱京伟（2003），《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白帝社，第 316 页。
- [46] モーリッツ・ゾイベルト著，丹波敬三等訳（1881），《普通植物学》，東京發兌書肆（島村利助），第 133 页。
- [47] 恩田重信（1900），《独和他国字书大全》，金原书店，第 423 页。
- [48] 神田乃武（1902），《新译英和辞典》，三省堂，第 616 页。
- [49] 井上哲次郎等（1912），《哲学字汇》，丸善，第 92 页。
- [50] 前田长太（1910），《民族発展の心理》，大日本文明协会，第 12, 17 页。
- [51] 张公表（1935），《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上海商务印书馆，第 14-15 页。
- [52] 李冬木（2008），《“国民性”一词在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第 92 号。

付記：本稿は 2023 年 5 月に中国・天津南開大学において開催された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第 15 回国際学術大会に提出し、口頭発表した後、多少加筆して完成したものである。本稿の執筆にあたり、神戸学院大学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の胡士雲教授及び神戸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館員の皆様から資料収集等多大なご支援をいただいたことに、ここに記して感謝の意を表します。

本稿は 2024 年度広東省哲学・社会科学計画研究プロジェクト（中国話語体系中的“人民性”概念嬗变研究）及び特別委託研究プロジェクト（“人民性”的概念・話語与叙事研究）の階段的な成果であります。

プロフィール：李冬松，厦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課程修了，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会員，神戸学院大学日本学術振興会研究員，暨南大学外国語学院准教授。